

中國近代帝國主義與民族國家

——與日本的亞洲主義之關聯

狹間直樹 著^{*}

陳威璿 譯^{**}

摘要

本文旨在討論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所提出的亞洲主義，與後來具侵略意義的帝國主義不同，乃是基於在國際上領導亞洲諸國以對抗歐美世界，為具正面價值之合作關係。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末在湖南的東亞會、上海的亞細亞協會、以及善鄰譯書館的創設，都是在亞洲主義的構想下進行，顯示中國改革派知識分子積極與日本合作，這形成了亞洲主義實體化的條件。其中譯書活動又為相當重要的一環，吾妻兵治、中江兆民等皆以漢文翻譯西方著作，此由於當時日本亞洲主義欲建立一個以漢文為共通語言的東亞文化圈，強調中日兩國的合作與平權，藉以抵抗西方英語世界，因而後來有善鄰譯書館的設立。然而，上述在亞洲主義下的合作關係最後仍以失敗告終，以善鄰譯書館的合作策略為例，由於中國無版權法，導致盜版橫行，中日兩國對版權問題亦有觀念上的歧異，譯書館最終運作失敗。此後，日本將文明開化

* 作者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名譽教授。

** 譯者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移植與輸入中國，也逐漸帶有優越性與侵略性，而走向了一般所理解的帝國主義。

關鍵詞：亞洲主義、帝國主義、東亞會、亞細亞協會、善鄰譯書館

Imperialism and the Nation State in Modern China

Hazama Naoki

Translated by Chen Wei-ch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sianism raised by Japanese after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Imperialism later with a sense of aggression is based on leading Asian countries to fight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positive partnership. The establishment of Toa-kai (East-Asia Association) at Hunan, Ajia Kyōkai (Asia Association) at Shanghai and Zenrin-yakusho-kan (Shanlin librar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re under the idea of Asianism, showing Chinese reformist intellectuals actively cooperated with Japan, which was the condition of realizing Asianism. Translating books were a vital activities of the chain of Asianism. Azuma Heiji, Nakae Chōmin and so on all translated Western books in Chinese,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Japanese Asianists wanted to make Chinese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emphasiz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 equal rights, in order to resist the Western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us establishing the Zenrin-yakusho-kan (Shanlin library). However, these

partnerships in Asia still failed. Take Zenrin-yakusho-kan (Shanlin library) for example, due to the lack of copyright regulation in China, led to the piracy problem. China and Japan also had different ideas on copyright. The idea of Zenrin-yakusho-kan (Shanlin library) eventually failed. Since then, Japan brought civilization into China with superiority and aggression and toward the so-called imperialism.

Keywords: Asianism, Toa-kai, East-Asia Association, Ajia Kyōkai, Asia Association, Zenrin-yakusho-kan, Shanlin library

中國近代帝國主義與民族國家

——與日本的亞洲主義之關聯*

狹間直樹 著

陳威璿 譯

前言

所謂中國的近代，是在東亞作為中華文明而屹立的傳統文明體制發生變化與重組的時代。在這個被西洋近代文明稱霸世界的浪潮所捲入的時代中，軍事和技術不在話下，橫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如何與西洋諸國為伍，對中國進行改造，已成為當時的課題。課題的中心是邁向近代民族國家的重組，然而以之為目標的活動，是以與日本特別深厚的關係為基礎而展開的。

對傳統體制的動搖來說，對外戰爭中，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相繼敗北乃是一大要因，這一點自不待言。其中最具有決定性的乃是甲午戰

* 譯者按：本文出自狹間直樹編：《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70周年記念シンポジウム論集》（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1年1月），頁9-24。該書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研討會之論文，主題為鴉片戰爭後，中國受到西洋列強叩關壓力下，受西方文明影響，而使中國文明產生變化的情形。該書分為「文明史」、「語言史」、「文化史」、「學術史」和「科學史」五個部分，共收22位學者的文章。

爭，因為「大國」清國敗給了鄰近的「小國」日本。日本的勝利原因被定位為明治「維新」的成功，如此一來，也導致了光緒帝受到康有為《日本變政考》的鼓舞，而向戊戌維新踏出一步的這種破天荒事態。

甲午戰爭的天文數字賠償金、德國獲得膠州灣等等列強租借地爭奪戰的這種亡國事態，要如何與中國的改造放在一起來看呢？梁啟超將這種環繞著中國的狀況，認知為世界史的「民族帝國主義」階段。¹「民族主義」是民族中的國民統合，「近代」是伴隨著民族主義之發露所導致的民族國家之形成一起開始的。這種新的國家，得以發酵的民族能量向外溢出，進而採取帝國主義的政策之階段，就是「民族帝國主義」。此刻朝向中國而來的，正是代表「民族帝國主義」的西洋諸國。梁啟超（1873-1929）的這種帝國主義認識，根據石川禎浩（1963-）的說法，是依據浮田和民（1860-1946）〈帝國主義的理想〉（帝國主義の理想）和獨醒居士（生卒年不詳）《時務三論》，而浮田之說又來自歐美的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以及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²

此處所說的「帝國主義」，和後世的通常用法不同，指的是應當歡迎的正面價值、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將自身置於最先進位置的歐美意識形態對之大加提倡，追步其後的日本論者全盤接受之，可說是理所當然。例如浮田就主張，「帝國主義」正是日本應採取的大方針，其「未必具有侵略義」，而是「保全一國之獨立」，「進而參與世界文明與政治之主義」，而且是「基於國際法的協定，向歐美諸國充分擴充我國人民之權利，並扶植亞細亞諸國之獨立。為扶植其獨立，

¹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清議報》第95號，1901年10月22日、《飲冰室合集》文集（以下略稱為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32年），第6冊，頁19。

² 石川禎浩：〈梁啟超と文明の視座〉，收於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頁121。

得誘導促進亞細亞諸國之改革」。³ 很明顯地，領導「亞細亞諸國」，同時對抗「歐美諸國」的這種主義，乃是甲午戰爭勝利後，將日本的國際地位理論化的最新說法。

那麼，對於身為戰敗國的中國人而言又是如何呢？簡單來說，正如梁啟超所說的，要將帝國主義「由弱肉強食之惡風，變為天經地義之公德」而成立，一方面是將中國逼入亡國之淵的敵人，同時又是自身所需達到的目標，就這樣被理解為具有雙重的關係。⁴ 不過，中國要成為「天經地義之公德」的旗手而進入列強之林，就必須脫離王朝體制，建立「民族國家」。為此，梁啟超寫下了《新民說》。⁵ 此時，正如同康有為認為中國可以在三年內完成日本三十年的成果那樣，⁶ 日本的前例乃是最好的催化劑。

《新民說》的骨幹為伯倫知理（Johann Kaspar Bluntschli，1808-1881）的國家學說，梁啟超乃是透過吾妻兵治（1853-1917，秋田縣人）所譯的《國家學》（善鄰譯書館，1899年12月）加以吸收。⁷ 梁氏在此書刊行之前，將譯稿題名為《國家論》，只記下「德國伯倫知理著」，連載於《清議報》第11號（1899年4月）以下。然而連載到第31號（1899年10月），該文就停止了，以極為不自然的形式中斷。這些細微難察的現象背後，就如同以下所揭示的，意外地隱藏著深奧的歷史發展。

³ 浮田和民：《帝國主義と教育》（東京：民友社，1901年），頁19、36。

⁴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1卷第2號，1902年2月22日、《文集》，第10冊，頁13。

⁵ 參考狹間直樹：〈《新民說》略論〉，收於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

⁶ 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摺〉，《近代中國資料叢刊 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冊，頁192。

⁷ 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淵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第100期（1997年7月）。吾妻之譯乃是平田東助、平塚定二郎所譯之《國家論》（東京：春陽堂，1889年）的漢譯。

一、日本的亞洲主義與中國的改革派 —— 1898 年的湖南與上海

甲午戰爭後的清國知識分子之間，將日本的文明開化援引作中國改革之用，因此並未進行報復，反而是與日本互相合作的活動十分盛行。在湖南和上海，面對更大敵人的共同步調之嘗試，對於揭示保全清國的日本亞洲主義運動，以呼應之的形態而起。眾所皆知，湖南省積極地推行新政，⁸而中心人物之一的唐才常（1867-1900），於1898年5月起草〈論興亞義會〉一文，主張透過與日本東亞會的合作來推行湖南新政。⁹

唐才常於這篇文章中，將日本人爲了使黃種人興盛，保護東亞而創立興亞義會（即東亞會）的舉動給予「仁矣，俠矣」的佳評。此處的「仁俠」，是認定中國的衰亡代表黃種人的衰頹，黃種人的衰頹代表日本的危機而發。這也就是在追求使中國與日本在同一層面上並列的合作策略。

於是根據唐才常之說，面對德國、俄國的侵略而幫助中國的日本，就好比在美西戰爭中幫助古巴的美國。當時，美國作爲「文明」、「公法」的守護者，在日本和中國都頗受好評。唐氏的構想等於是烘托日本人，¹⁰但可以知道，上述浮田所說的西洋、日本、中國

⁸ 小野川秀美：〈戊戌變法と湖南省〉，《清末政治思想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69年）。

⁹ 唐才常：〈論興亞義會〉，《湘報》（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第65號，1898年5月、《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77、〈東亞會簡明章程 即興亞義會〉，《湘報》同期。〈章程〉等之興亞會資料僅見於《湘報》，藤谷浩悅：〈戊戌變法と東亜會〉，《史燭》第2號（1989年）指出這一點。以下所利用的《湘報》所收資料，與《湘報類纂》（臺北：新文彩色印書館，1968年影印）所錄者有若干異同。

¹⁰ 佐藤宏：〈支那朝鮮の真相を説きて同国を改造するは日本人の責なる所以を論ず〉，《日本人》第63號（1898年3月）。另外，對於保全中國的策略，梁啟超評爲「仁人君子之用心」，參見〈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清議報》第55號，1900年8月25日、《文集》第5冊，頁54。

的關係性，已在現實中獲得中國改革派知識分子之共鳴作為基礎。這雖然不能算是需要注意的成果，但也值得留意了。

另一方面，在上海活動的是亞細亞協會。亞細亞協會如同下文所述，是擁有歷史與實績的亞洲主義團體。發起人之一福本日南在當時，如此傳達上海的狀況：「日清同盟論不分朝野官民，乃是當國眼前的大希望」、「清國人士非常信賴如今的日本」。¹¹ 日本方面的組織者為協會會員、駐上海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1868-1934）。得到日本資金，準備進行組織活動的鄭孝胥（1860-1938）也有所呼應。¹² 文廷式（1856-1904）、鄭觀應（1842-1922）、鄭孝胥等人的呼籲，使得分會於1898年4月26日成立，創立的大會上，張謇（1853-1926）、江標（1860-1899）、汪康年（1860-1911）、經元善（1840-1903）等二十多人出席。推動湖南新政而頗受好評的江標、獲得科舉狀元而選擇實業救國之道的張謇等，眾人皆是身為改革派而知名的錚錚之人。

參加者的積極程度，可由中國方面堪稱代表的江標之發言窺知。他為了振興鄉里，站在以「協」字為基礎的對等立場，向富有「興亞之志」的小田切，強烈要求派遣「日東之名師」。如果這一點實現了，那麼就如同記者所說的，上海分會的啟動確實應當是「亞洲第一盛事、興起之轉機」。¹³ 歷任重慶東川書院山長等職位，身為教育界重鎮的江瀚，攜弟子進入亞細亞協會，¹⁴ 無疑地也是規劃雙方的合作。亞洲主義實體化的條件，在當時確實已經存在了。

¹¹ 東亜同文会編：《對支回顧錄》（東京：東亜同文会对支功勞者伝記編纂会，1936年），下卷，頁878。

¹²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冊，頁644。

¹³ 〈興亞有機〉，《申報》1898年4月29日（轉載於《湘報》第62號）、〈興亞大會集議記〉，《湘報》第69號、《鄭孝胥日記》第2冊，頁653、湯志鈞：《戊戌時期學會與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483。

¹⁴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冊，頁263。

二、亞細亞協會中所見之亞洲主義表現

由唐才常在湖南設立分會的東亞會，¹⁵ 據《湘報》所說，其主旨為「專主講求東亞之振興，圖其實行」（第二條），於1898年4月開始活動。犬養毅（1855-1932）等進步黨系政治家、三宅雪嶺（1860-1945）、陸羯南（1857-1907）等「日本人」團體、井上雅二（1877-1947）等學生們為中心所創立的該會，旋於同年11月，與近衛篤磨率領的同文會合併，改組為東亞同文會。¹⁶

另一方面，亞細亞協會係由1880年3月時創立的興亞會，於1883年初改名而成。此會乃是面對歐洲的進攻，為了挽回亞洲的頹勢，以日清兩國須進行合作為主旨的亞洲主義團體，於1900年3月為東亞同文會所吸收。這些基本的說明，還請參考針對貴重的《興亞會報告》、《亞細亞協會報告》進行蒐集復刻的黑木彬文（1941-）、鱒澤彰夫（1949-）二人的解說。¹⁷

附帶一提，前文提及的伯倫知理《國家學》之漢譯者吾妻兵治係亞細亞協會的會員。他於1883年7月入會，旋即擔任會報編輯。¹⁸ 吾妻曾為由中村正直（1832-1891）主辦的同人社機關誌《文學雜誌》的編輯，相關工作應是十分擅長。由於吾妻罹病，第15號（1884年9月）至第17號（1885年3月）的編輯由岡本監輔負責，¹⁹ 其後第18號（1885年9月）時吾妻回歸，與草間時福（1853-1932）等人共同

¹⁵ 〈東亞會簡明章程 即興亞義會〉，《湘報》第65號、〈續登東亞會會員姓名 明治三十一年四月〉，同刊第66號。

¹⁶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頁110、120；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亞同文會史》（東京：霞山會，1988年），在此處亦依據酒井氏之書。

¹⁷ 黑木彬文：〈興亞會・亞細亞協會の活動と思想〉、鱒澤彰夫：〈興亞會の中國語教育〉，皆收於《興亞會報告・亞細亞協會報告》全二卷（東京：不二出版，1993年）。以下的興亞會、亞細亞協會相關資料，均據此書。

¹⁸ 宮內默藏：〈吾妻醒軒君行略〉，《英漢和對訳 泰西格言集》（東京：敬文館，1922年），卷首、《亞細亞協會報告》第7號（1883年8月）。

¹⁹ 岡本の入會時間為1884年3月（《亞細亞協會報告》第14號）。

擔任編輯。吾妻的動靜之所以幾乎全被埋沒，或許是未在東亞同文會活動之故。

此外，說到吾妻與岡本進行編輯工作的1883年夏天至1885年秋天，乃是發生中法戰爭、甲申事變，東亞情勢為之激變，福澤諭吉有名的「脫亞論」登場的時期。然而從《時事新報》要求相對於興亞會，設立脫亞會的這一點來看，²⁰ 可以知道亞洲主義在當時是具有相當力量的。《亞細亞協會報告》基本上是用漢文編成的，看上去幾乎像是中國的雜誌這一點，亦可作為一證。特別是在吾妻回歸編輯後，甚至決定了接受「清國公使館員之增刪」的方針。²¹

原本《亞細亞協會報告》在〈例言〉中，就因為日清韓三國「同文」之故，而併用「國文」與「漢文」。這種以漢文為共通語言的嘗試，已有廣部精為「亞洲各國人士閱覽之便」，僅以漢文（清國官話）來編輯興亞會機關誌的前例（雖然不久就設立「和文雜報」專欄）。這絕非時代錯誤的復古主義，而是創造以清國官話為共通語言的東亞「文化」圈，對抗以英語為通用語言的西洋的這種適合「近代」的實踐。²²

另外，廣部之構想的社會背景，乃是重要學者重野安繹所主張的，以「正則」來修習「漢學」之正則論。²³ 「正則」指的是「熟其音韻，通其語言」，「熟其話音，經史諸書亦可自在音讀」，以此可「兩國之人情世態彼此相通」，「振起我東洋之國勢，出於歐美各國之上」，主張須從直接學習外語開始。廣部作為重野的弟子，構思了一套「官話論」。

中江兆民（1847-1901）對盧梭（1712-1778）《契約論》所做的改

²⁰ 〈日本は東洋國たるべからず〉，《時事新報》，1884年11月13日。

²¹ 〈本会記事〉，《亞細亞協會報告》第18號，1885年9月。

²² 廣部精：〈官話論〉，《興亞會報告》第12號，1880年11月。

²³ 〈重野安繹演說〉，《興亞公報》第1號。重野安繹為日本近代歷史學之開創者，1879年創立之東京學士會院（日本學士院之前身）會員。上述演說承襲了刊於學士會院雜誌的〈漢学宜し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み清國に留学せしむべき論說〉之主旨，於興亞會創立總會上進行發表。

譯，或許也與這種動向有所關聯。兆民在明治七年（1874）將之和譯為《民約論》之時，又如同飛鳥井雅道（1934-2000）所指出的，於其後叩於三島中洲（1831-1919）、岡松甕谷（1820-1895）門下，鍛鍊其漢文，進行漢譯之改譯《民約譯解》，〈卷之一〉出版於明治十五年（1877）。²⁴ 就其透徹的譯文這一點來看，改譯的嘗試非常成功。然而諷刺的是，兆民譯並未十分受到東亞讀者的歡迎，流行的是重譯自原田潛（生卒年不詳）譯《民約論覆議》的楊廷棟（1879-1950）譯《路梭民約論》。經由田桐（1879-1930）的「重新發現」，兆民的勞苦被發掘出來，並被指出盧梭所說的「共和原理」，只有透過《民約譯解》才能加以認識。²⁵ 這件事可以當作作為東亞共同語言的漢文，其適切性究竟如何的探討素材。

吾妻兵治除了以透過文章進行相互理解為目標，又主張使「往來交通」興盛，使「日清交際」更密切，藉此「敦鄰交，致富強」。而且，這種交際就像「歐美化」一樣，「土庶」的來往必須如實地「由下而上」，使彼此志同道合。²⁶

眾所周知，「脫亞」風潮的流行，是與對中國和朝鮮的蔑視互為表裡的。²⁷ 然而另一方面，上述的興亞論、亞洲主義也興起了。而且吾妻不僅是主張與中國共同合作，對於朝鮮也給予「堂堂朝鮮」之評。²⁸ 此外，吾妻也將自己的亞洲主義理念，與經濟基礎相結合來提倡。他認為，亞洲與歐美之間的隔閡在於「通商」之差。如今西洋商

²⁴ 飛鳥井雅道：《中江兆民》（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年），頁116。

²⁵ 狹間直樹：〈中国人による《民約訳解》の重刊をめぐる〉，《中江兆民全集》別卷月報（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關於讓田桐重新發現之改譯的意義，參見宮村治雄：〈中江兆民と「立法」——《民約論》と《民約訳解》の間〉，《開国経験の思想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²⁶ 〈論往來交通之利〉，《亜細亜協會報告》第7號。

²⁷ 芝原拓自指出，此現象在明治十年（1882）左右已可得見。芝原拓自：〈對外觀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 對外觀》（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頁509。

²⁸ 吾妻兵治：〈朝鮮政党辨〉，《亜細亜協會報告》第7號。

人可以前來東洋，東洋商人卻不能前往西洋，「商權」掌握在西洋手上，日清「兩國合體」，進而將商權收回，乃是當務之急。²⁹ 日清兩國的政治「合作」以及進入日本的通商，經常是熱門話題，而吾妻將兩者合而為一，又在「通商」這一點上，確立了「私利的追求」和「公利的實現」兩者乃互為表裡之見解。在此最好能看到：日本民權論的特色——「對外之國權」，也就是亞洲主義中從平等立場出發的國權。

三、善鄰譯書館

甲午戰爭後，吾妻兵治等人結合日清兩國共同合作之理念與經濟活動之實際面，創立了善鄰譯書館。³⁰ 在擔任《亞細亞協會報告》編輯時，吾妻於外務省任職，進行翻譯相關之工作。1890年8月擔任「陸軍教授」，1896年6月依願離職。經過兩年餘之後的1898年10月，他與志同道合者於神田猿樂町展開善鄰譯書館的活動。該館創立時，吾妻等人對板垣退助（1837-1919）和小村壽太郎（1855-1911）積極遊說，從而獲得外相機密費兩千圓的補助。³¹

善鄰譯書館當初的刊行書為《大日本維新史》、《國家學》、《戰法學》、《日本警察新法》四部。可見之三書的版權頁部分，皆記載「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印刷」、「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行」。

²⁹ 編者（吾妻兵治）：〈論日清宜收握商權〉，《亜細亞協會報告》第8號。黑木彬文將這篇文章定位於仁禮敬之日清朝三國貿易振興論的延長線上，以「合邦」來理解「合體」，〈興亜会の壬午軍乱への対応〉，《政治研究》第31號（1984年3月），頁29-48。

³⁰ 〈株式会社 善隣訳書館 株式組織ト爲スノ理由／目論見書／營業設計／營業説明〉，德島縣立圖書館藏《岡本韋庵文庫》文書（以下略稱為《韋庵文書》），全15頁。韋庵為岡本監輔之別號。上述書名係依據該圖書館編：《岡本韋庵先生藏書及原稿目錄》「265號」所記簡稱〈善隣訳書館開業趣意書〉。以下注解為「韋庵文書」者，均為上述「265號」內之文書。

³¹ 前掲〈吾妻醒軒君行略〉。兩千圓為〈善隣訳書館開業趣意書〉所記載。每本書之平均，若以五千套書一千圓為基準來計算，可滿足下文所提到的四部書之製作費的一半。

同時亦附有「著作者」、「發行者」、「印刷者」三項，然發行者部分寫著「善鄰譯書館（右代表者松本正純）」，特別記載著社名。《日本警察新法》未能得見，不能確知，但或許亦有同樣的文字。三書的「著作者」、譯書館以外的「發行者」，以及「印刷者」部分如下：

《大日本維新史》著作者：重野安繹

發行者：國光社（右代表者西澤之助）

印刷者：野村宗十郎

《國家學》著作者：吾妻兵治

發行者：國光社（右代表者西澤之助）

印刷者：河本龜之助

《戰法學》著作者：石井忠利

發行者：靜思館（右代表者鴨島實）

印刷者：河本龜之助

在著作者的〈自序〉中，重野的頭銜僅寫著「文學博士」，不過在館中的角色或許是「顧問」。吾妻的則是「善鄰譯書館幹事」，大致表示其專任身分。寫著「參謀本部員陸軍砲兵上尉」的石井，乃是贊成趣旨的原稿執筆。發行者部分將該館以外的社館一併記下，這可能是爲了確保販賣通路。印刷者不只一間，應當是爲了能夠趕上十二月十三日的發行日。無論如何，三書的封面題字皆出自著名書法家石埭居士永坂周（生卒年不詳）、內封面的「大日本／善鄰譯／書館版」藏版印，其外形與大小皆一致，從這些地方來看，其刊行叢書的意圖清晰宛然。

1900年1月初，吾妻帶著上述四書「數萬部」，與松本一同渡華。³²報導他們來到上海的《申報》，對於善鄰譯書館之事記載著相當詳細的說明：「重野、三島、岸田、龜谷、蒲生、吾妻、松本諸

³² 〈善隣訳書館開業趣意書〉，頁1、中村義：《白岩龍平日記 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東京：研文出版，1999年），頁348（1月5、7、8日條）。

人」共同出資翻譯，爲了將西方著作推廣於中國而創館。³³「三島」爲三島中洲（1831-1919），「岸田」爲岸田吟香（1833-1905）。而館方代表者松本正純（1866-？）爲三島之弟子，「龜谷」爲龜谷省軒（生卒年不詳）（行），「蒲生」爲蒲生髮亨（1833-1901）（重章）。³⁴

《申報》對善鄰譯書館誕生的時代背景之說明，十分耐人尋味。其中給予了這樣的好評：在甲午戰爭勝利後的日本，對俄國的擴張策略懷有高度警覺，產生了「欲使日本躋身強國，非聯合中國不可爲其功」的合作論。眾人彼此在各自的位置上實行合作之舉，基於這一點，「文人學士」爲了翻譯「東西各國之良法美意」，將之移植於中國，而創立善鄰譯書館，這體現了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敦睦之心」，知識分子投入「以新法惠我中國」之舉，此乃日本官民一體的對華合作政策之實踐。

認爲需要以日本爲媒介來吸收西洋「新法」的思想，並非上海人所獨有。對此，內藤湖南（1866-1934）留下寶貴的證言。1899年10月4日，湖南於天津會晤陳錦濤（1871-1939，廣東省南海縣人）與蔣國亮（生卒年不詳）時，蔣氏問說：「翻譯貴國書籍而作中文，此乃大有益之事。既以開支那文明，貴國又得其利，如近日之《萬國史記》、《支那通史》，中國人買此書者甚多。惜此類書，譯出者甚少，故弟極願貴國人多譯東文書，如貴國維新時之史，及學堂善本，猶爲有益。君以爲然否？」陳錦濤在當時爲天津北洋大學堂教習，後留學美國，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財政總長，屬改革派。蔣國亮之事未詳，然其思想傾向，可從與湖南之問答得知。

對於蔣氏的希望，湖南答曰：「現設有善鄰譯書館，吾妻某氏、岡本監輔翁等，方從事翻譯。聞貴國李（盛鐸）星使亦頗贊

³³ 〈善鄰有道〉，《申報》，1900年1月8日、〈記日本創設善隣譯書館事 系之以論〉，《申報》，1900年1月10日。前者將重野當作呼籲創立之人。

³⁴ 《現代人名辭典》（東京：中央通信社，1912年）（《明治人名辭典》I，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7年）。其中提到，松本（1866-？，和歌山縣人）與重野、岸田設立善鄰譯書館。這一點承蒙中村義、楊天石、桑兵的指教。

同此事……《萬國史記》即岡本翁之作，《支那通史》為那珂通世之作，二君僕皆識之。」³⁵「吾妻某氏」即吾妻兵治，而岡本監輔（1839-1905，德島縣人）在上文已提過，曾協助編輯《亞細亞協會報告》。內藤似乎連吾妻等人準備刊行的書名都不知道，然而在會談過後僅兩個月即刊行的四部書，從〈序文〉來看，正切合內藤對蔣氏所願的保證。《大日本維新史》的作者重野，謳歌明治「新政之美」，稱維新以來三十餘年「銳意勵精，刮刷振作，駸駸乎日耀國威於海外」，亦表示此乃對於孔子「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通時變」的適宜呼應。與此同時，其言外之意，也是在宣示這是為了對中國之改革發揮作用而寫的著作。另外《戰法學》的作者石井也明確表示，對於善鄰譯書館編成新書，意圖「輸入清韓以資其文化」的宗旨，自身著作亦將發揮些許作用。另外，《國家學》的作者吾妻，更進一步不憚斷言道，對明治日本之建設發揮作用，「公而不偏，正而不激」的伯倫知理學說，「於我亞細亞人有鴻益而無小弊」。

從內藤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吾妻和岡本合力創設善鄰譯書館，但岡本最初所構思的是「善鄰義會」乃至「善鄰協會」。岡本所起草的〈善鄰義會五規〉，其主旨為「以固唇齒相保之勢，以盡同舟共濟之義，蓋使同文諸國人民，均躋身開化之域，以永保天祿於亞細亞洲內」。³⁶對此，三島中洲僅有字句上的修正作為意見，重野安繹則盛讚其構想為「東洋全局之幸福」、「對國家有益」之「遠志偉略」。作為具體的策略，岡本首先構思了具有上述性質的翻譯出版機構「善鄰協會」。以吾妻為主，另外也可能容納了重野、三島等人之意見而確立的〈善鄰協會主旨〉，發表於1898年11月。³⁷大致上沿襲〈善鄰協

³⁵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收於內藤虎次郎編：《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第2卷，頁60。

³⁶ 〈善隣義会五規〉（《韋庵文書》）。

³⁷ 〈善隣協會主旨〉，收於〈西報譯編〉，《清議報》第2號，1899年1月2日。此文並無署名，然而從《韋庵文書》所收五種〈善隣協會主旨〉，可判斷此係由岡本起草。

會主旨〉的〈善鄰譯書館條議引〉，³⁸以吾妻的名義發表於上海的《亞東時報》，從這一點可以得知，善鄰協會在一年後變為善鄰譯書館。然而在內藤口中與吾妻並列的岡本監輔，何以自善鄰譯書館的活動中抽身，則未詳其所以。

順帶一提，上述「內藤蔣會談」的中略部分，乃是內藤對於清國沒有版權法，導致盜版橫行，完全無法建立出版合作關係的不滿。事實上，清末是盜版日本書³⁹達到刊行高峰的時代，尤其是會談中提到的岡本，其《萬國史記》估計被翻刻了30萬以上四處流傳。當然，這對善鄰譯書館而言乃是根本的問題，吾妻等人的上海之行，也以盜版對策為重要任務。上文提到的《清議報》上，《國家論》連載甚為離奇的中斷，無疑地也來自善鄰譯書館成立時，吾妻等人表達的抗議。⁴⁰

面對內藤的不滿，蔣氏回答說，雖然沒有法律上的規定，但應可自地方官處獲得禁止翻刻之告示。吾妻等人似乎也被如此告知，中國官方也允其「因吾館之故，特發布翻刻禁止令」。此時，基於甲午戰爭，中國方面「大起信賴吾國之念」，「所到之處，巡撫道台等大讚吾國之善行，率先採買譯書，各謀普及於其地方之道」。⁴¹這值得視作當時十分高昂的「合作」之聲的一種表現而留意之。

用這樣的方式解決版權問題之後，接下來考慮的就是將善鄰譯書

³⁸ 吾妻兵治：〈善隣訳書館條議引〉，《亞東時報》第21號，1900年4月28日。然而，其中也有涉及其他機構，疑似脫離岡本一方的史料（計劃著刊行《萬國通典》、《列國史鑑》、《明治字典》、《皇國文藝傳》、《國士美談言行類纂》等與善鄰譯書館無關之書）。

³⁹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村本文庫」本《萬國史記》（無版權頁），乃是在內封面上明確寫著「光緒丁酉（1897）孟春／慎記書莊石印」的盜版。京都大學文學部「內田文庫」本《大日本維新史》（無版權頁），則是偽裝成善鄰譯書館版。還有，中江兆民《民約譯解》，也有盜版的《民約通義》（1898）。

⁴⁰ 《清議報》第31號（1899年10月25日）之末，為「三權原非同階並列，蓋作機（此稿未畢）」，就此中斷，第32號（1899年12月13日）以降，完全不見登載，亦未有任何說明。梁氏與吾妻之間的關係不詳，但從《清議報》隱去譯者名來看，雙方並不親密。

⁴¹ 〈善隣訳書館開業趣意書〉，頁2。

館變為「股份有限公司」來進行擴充，於是乎有了上文屢次引用之〈善鄰譯書館開業趣意書〉的成形。其藍圖如下：⁴² 股份有限公司的資本總額為20萬圓，第一次股本5萬圓，新書35種的出版費為3萬5千圓，估計銷售狀況可穩定達到初版1萬部，這一點是根據文廷式的說明，以閱讀人口有40萬人以上為前提來計算。依此，合計共有13.5%之多的紅利。若一切均如此預測一般進行，則營利性的「私利的追求」將變為國家性的「公利的實現」，以透過出版事業的這種合作為基礎，日清兩國應可在文明史的階段中往上升，迎頭趕上西洋。然而實際上，發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故，⁴³ 幸福的關係止於夢想，看似一片光明的計畫只能以失敗告終。

結語

甲午戰爭後，東亞情勢的一個特色，乃是中國表現出積極呼應日本提倡之亞洲主義的活動，日本方面也規劃、實踐了追求對等合作的具體策略。上文所提到的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擔任日本人刊行之《亞東時報》的主筆，持續熱心地宣稱與日本的合作乃是對「支那國民精神」的喚起，更是亞洲的保全之道。⁴⁴ 還有，逃亡後的梁啟超甚至也主張，與「唇齒兄弟之國」日本「共同合作」，正可「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為了將來的「合邦」，「言語互通」乃「聯合第一義」。⁴⁵ 在此可以認為，日本與中國互相合作，共同面對西洋，這種足以使浮田所說的「帝國主義」實行的歷史條件，已然客觀地存在

⁴² 〈善隣譯書館開業趣意書〉，頁10-14。

⁴³ 在〈行略〉中提到的理由，為所攜帶前來的數萬冊書籍受到義和團影響而燒失。

⁴⁴ 唐才常：〈日人實心保華論〉，《唐才常集》，頁192、《亞東時報》第17號，1899年11月。

⁴⁵ 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清議報》第10號，1899年4月1日、《文集》，第4冊，頁82。該文轉載於《東邦協會會報》第58號，1899年5月。

著了。

然而，在此時代條件下，作為日中合作之具體策略而設立的善鄰譯書館，其失敗的理由之一，是無法解決其運作之重要前提的版權問題。地方官禁令的這種「人治」主義式的處理方式並不適宜，自不待言。此外，雖然這涉及到另一個研究課題，不過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對於自身文化水準的提升，主張沒有版權法的狀況較佳。森時彥（1947-）指出，在日清版權同盟問題上，梁啟超和天野為之（1861-1938）斷絕來往。這就是顯著的一例。⁴⁶

在版權問題上，日本方面確實採取對等合作的形式，實行亞洲主義的提倡。然而，日本先進性的強力推行，容易變為優越性的強迫，而走向侵略性的「國權」主義，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帝國主義。這一點從最初開始便帶有濃厚色彩。從岡本監輔所構思，實際上也進行了相當規模之實踐的學校問題中，以清國教育改革為日本使命的1902年《教育實論》之社論內即可得見。⁴⁷ 這一點從一開始便已具有濃厚色彩。其中提到：「東亞先覺者、先進國之我日本，對後進生、後進國之彼清國予以誘導啟發，使彼四億萬生靈沐浴於世界共通文明，開拓天予無限之富源，以進國家於富強之域，導民人於幸福之境，此為我國當然之天職。」另外又提到，學校建設乃是為了「輸入我邦文化於清國，啟發人民知識，注瀉我精神主義於清人，扶植帝國勢力」，而不可或缺者。

⁴⁶ 森時彥：〈梁啟超の經濟思想〉，《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頁251。或許是基於此立場的實踐，梁啟超將《清議報》刊載的伯倫知理《國家論》〈卷之一〉部分，題為〈國家學綱領〉，之後則以「譯者飲冰室主人」的名義，於1902年5月將之刊行於上海廣智書局。

⁴⁷ 尾崎ムゲン：〈教育雜誌にみるアジア認識の展開〉，收於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頁310。其中粗糙的一例，參見細野浩二：〈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東文学堂』とその周辺〉，收於阿部洋編：《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 戦前日本在華教育事業》（東京：第一書房，1983年），頁52。

日本的優越性的強迫，終至形成對中國國家建設的否定與妨害。接著，正如日後的歷史開展一般，「亞洲主義」反而留下了充滿負面的印象。這愈來愈讓人認為，必須回到善鄰譯書館所體現的對等合作之實踐才好。

徵引書目

《申報》

《東邦協會會報》

《時事新報》

《清議報》

《湘報》

《新民叢報》

《興亞公報》

〔日〕《興亞會報告・亜細亜協會報告》，東京：不二出版，1993年。

〔日〕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69年。

〔日〕中村義：《白岩龍平日記 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研文出版，1999年。

〔日〕内藤虎次郎編：《内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

〔日〕古林龜治郎編：《現代人名辭典》，東京：中央通信社，1912年。

〔日〕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

〔日〕平田東助、平塚定二郎譯：《国家論》，東京：春陽堂，1889年。

〔日〕佐藤宏：〈支那朝鮮の真相を説きて同国を改造するは日本人の責なる所以を論ず〉，《日本人》第63號，1898年3月。

〔日〕吾妻兵治：《英漢和对訳 泰西格言集》，東京：敬文館，1922年。

〔日〕東亞文化研究所編：《東亜同文会史》，東京：霞山会，1988年。

〔日〕東亜同文会編：《對支回顧録》，東京：東亜同文会对支功勞者伝記編纂会，1936年。

〔日〕芝原拓自：《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 對外觀》，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

〔日〕阿部洋編：《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 戦前日本在華教育事

- 業》，東京：第一書房，1983年。
- 〔日〕飛鳥井雅道：《中江兆民》，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年。
- 〔日〕宮村治雄：《開国経験の思想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 〔日〕浮田和民：《帝國主義と教育》，東京：民友社，1901年。
- 〔日〕狹間直樹：〈中国人による《民約訳解》の重刊をめぐって〉，《中江兆民全集》別卷月報，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
- 〔日〕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 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
- 〔日〕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 〔日〕藤谷浩悦：〈戊戌變法と東亞会〉，《史燻》第2號，1989年3月。
-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淵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第100期，1997年7月。
- 李毓澍主編：《湘報類纂》，臺北：大通書局，1968年影印。
- 唐才常著，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32年。
- 湘報報館編：《湘報》，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
- 湯志鈞：《戊戌時期學會與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